

# 邪马台国方位危言

## 以古代中国人海外时空观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高 洪

邪马台国位置问题是日本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长期以来,史学界为探索这一千古之谜作了大量工作,对相关文献史料的考证达到穿细入微的程度,考古学界也不断为各派观点提供物证,结果使问题更为复杂,莫衷一是。

在林立的诸家学说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九州说”和“畿内大和说”,即主张邪马台国地处今天的九州或近畿大和地区。此外,还存在对日本的中国地方、爱媛县、德岛县、山梨县、南洋群岛、菲律宾乃至埃及等地的种种比定和推测。持“九州说”与“畿内说”的学者们通过历史文献学、语言发声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地理学等方法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当时日本社会状况以及中国的典籍文献、地图编制、度量衡单位、行程划定方法等角度提出若干破译方案。然而,双方立论均以改动《魏志·倭人传》中关于行程或方向为前提,故而难以驳倒对方,无法作出定论。笔者不揣冒昧,愿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三国、两晋时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主要是古人对“天下”及“海外”的方位意识)入手,提出一孔之见,以就教于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同道先学。

### 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魏志·倭人传》中,有关邪马台国地点的记述主要有以下内容:“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同渡一海千余里……至一大(支)国……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皆统属女王国……东南至奴国百里……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问题是如果从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狗邪韩国按照《魏志·倭人传》所述行程距离和前进方向去寻找邪马台国,其位置只能在九州以南的大海之中或今冲绳诸岛之间,显然是不成立的。于是,“九州说”学者力主将“陆行一月”改为“陆行一日”;而“畿内说”学者则大多主张将“南至投马国”、“南至邪马台国”的“南至”改为“东至”,以求自圆其说。但是,在尚无其它史料印证、缺少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随意更改古书是不足取的。因为,第一、中国历史上官修正史的主要目的是为皇朝提供统治的借鉴,治史是一项极为严肃认真的活动。古史,尤其是官修正史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近年来,许多过去被认为是史料记载有误的历史疑案,由于考古发掘的新进展而验证为确有其事,证明中国正史(在某些场合也包含野史、杂史)是言之有据和可资凭信的。

第二、《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往赴邪马台国的行程距离一般不会有错。首先,对于“汉时有朝见者”(实际上中日民间交通往来势必更早)的日本九州地区,其行程里数应该是有较深了解的。而且,从史料来看,仅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以来的十年之中,女王使节七次使魏,魏使两度赴日,在如此频繁的交往中,魏使及负责记录该项外交活动的官吏对了解较多的对马国、一支国以及九州的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等地里程记载,自然应当是比较准确的。这里用“里”来记述走行距离,既是合理的,也是可靠的。其次,对于相对陌生的投马国、邪马台国,由于“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道路如禽兽径”,转而采用“夷人不知里数但以计日”的借助倭人以日记程的办法,既是稳妥的,也是可行的。在此要着重强调的是,使节们对后半段路程的长度虽然不能准确把握,但行走共花费多少日时,即用了多少天的数字绝不会搞错。因此,在没有任何史料旁证的前提下,轻改古史是不能服人的。

第三、如果里程记述不虚,那么方位,或曰行走方向为什么记为“南至”呢?中日两国史学界中持“畿内说”的学者大都认为实际上是“东至”,也就是说要把不弥国之后的“南行”改为“东行”。可是,如此改动仍然缺乏史料凭据,仅仅基于主观推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笔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方位关系(九州同本州之间的相对位置)的认识存在错误,而且这种错误观念还长期影响到后世。日本学者室贺信夫在《魏志倭人传中描绘的日本地理像——地图学史的考察》一文中对历史地图为考证以及中国一些学者所做的相近的论证都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历史地图来看,《华夷图》的注记、朝鲜的金士衡、李茂根据元代吴门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及明初天台僧清濂的《混一疆理图》绘制而成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都把本州放置在九州的南面(九州的下方),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证据。相反,如果将古代中国人描绘的日本列岛以九州中部为轴心由南向东做90°逆时针旋转,才能得到列岛实际的正确位置。由此可见,当时的使节或其他通交人员到达九州后,把自己实际上向东的前进方面错觉为向南行进,因而留下了“南至”的错误记录。

导致这一错觉发生的原因何在?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错觉的产生往往是在知觉对象的客观条件有了某种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错觉往往与人们过去的知识经验有关,又往往是各种感觉互相作用的结果。曹魏使节囿于自己对“天下”的知识经验,在有限的地理概念影响下对日本列岛在“天下”中所处的位置有错误的理解,加之对白昼定方向主要依靠的太阳的视运行的错误认识,自然难免发生以东为南的错觉。换言之,假如我们设身处地地从魏使的时空观念(即古代普通人对大地形状和天地关系,而非当时天文学家曲高和寡的推论)出发,就不难得出从九州向本州行进是在向南走的错误结论。揭开魏使将实际上的“东行”误记为“南行”之谜的关键就在于此。

下面我们循着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古人对时空,方位,尤其是海外方位的一般认识,去探讨邪马台国的方位。

## 二、古代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和倭在天下的位置

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对宇宙生成的认识过程一样,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对天地的产生亦有种种猜测,我们今天还可从神话传说中窥视到这些蛮荒时代的遐想。

从周至两晋,中国古代哲人先后提出六种关于“天地”——宇宙结构的设想,即所谓盖

天、浑天、宣夜、昕天、穹天、安天等六家学说,后人称之为“论天六家”。六家之中,以盖天说、浑天说的影响为大,特别是盖天说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人对“天下”认识的正统观念。

今天,一般认为盖天说起自周代。《周髀算经》中记有商高告诉周公“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的内容,该说后因“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sup>①</sup>的提法得名。在人们认识水平低下的远古,从直观出发去观测身边的自然环境,很容易得出天空象半圆的巨大罩子,盖在平直的地面上的感觉。这种朴素的宇宙观在战国已经为世人所接受,似乎成了古来中国人对天地关系的最初认识。宋玉(公元前三世纪人)在《大言赋》中就曾唱到:“方地为车,圆天为盖”。后来,孔子用“天圆地方”比附“天尊地卑”、“天地阴阳”的道,“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sup>②</sup>将这种原始朴素的天地观同社会政治结构相联系,使之具有普世性。战国末年,秦国的吕不韦又进一步阐发为:“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sup>③</sup>对自然的认识扩展为世界观,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广泛影响。秦汉以后,对统治集团成员的朝臣、官吏们来讲,“天圆地方”、“天尊地卑”的理念,是将自然观与社会观有效地统一起来的宇宙结构,既容易消理解,又符合位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因此,“天圆地方”这一早期盖天说占据了世人天地认识的主导地位,并在横向上向地处周边的区域辐射。一些少数民族亦基于自身的天地观念与之认同,譬如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大将斛律金唱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sup>④</sup>在纵向方面,这种观念向后世传播,几乎沿袭至封建社会晚期,保存至今的北京天坛和地坛就分别为正圆形和正方形建筑,恰恰是这种正统天地观念的写照。

那么“盖天说”的具体解释如何呢?古人曾对此做了种种臆测。最早的解释大约是关于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的说法,<sup>⑤</sup>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等各州如井田制的“井”字排列,洛阳位于天下之中。此说无疑是基于人们对中原的认识而给定的概念。到了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大九州说”,认为禹时的九州仅仅是中国本身,叫“赤县神州”。而在“赤县神州”之外还另有八个州,合为真正的“九州”,这个“九州”之外环绕着“裊海”,“裊海”之外更有八个“九州”,之外又有“大瀛海”包围,“大瀛海”外即是天边地界。因而,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sup>⑥</sup>而《淮南子·地形训》中描述的“天下”则是另一种“九州”的解释,即所谓“九州之外”,乃有八蛮,八蛮之外,而有八蛮,“八蛮之外,乃有八极”,“八极”便是天地的边界。

至于天圆地方说中大地的面积,或者说“地广”,同样有各种各样的推算。《山海经》记为“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邹衍的学说已不可考,但据王充的推算,邹衍的“天下”大体为“二十二万五千里”。而王充本人则估计为南北十万里,东西十万里,“相承百万里”。<sup>⑦</sup>此外,《河图括地图》中则讲:“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sup>⑧</sup>而且,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还专门讲述了一套计算大地广度的方法,得出“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结论。但无论何种算法,大都认为从天下之中洛阳向南行一万三千里左右便可到达四海之内大地的南部边缘,而这条南部边缘又正是古人理解的太阳运行轨道的下方,这一点分析魏使到达日本九州后将东行误记作“南行”问题至关重要。

除了盖天说外,浑天说以至宣夜说等等也是古代中国人对天地形状、大小的不同学说。

然而,浑天说实际上仍未跳出地平(天圆地平)观念的窠臼,⑨宣夜、昕天、穹天、安天等说仅限于理论探讨,并未被世人普遍接受。总之,三国两晋时期普通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恐怕只能建立在盖天说指导下的天圆地方观念之上,并不精通天文知识的朝廷命官亦不能免俗,何况他们更需要信奉符合王纲法纪的天地观念。

在当时中国人的方形大地观念中,日本处于什么位置呢?这一问题是理解魏使将日本九州向本州的东行误解为“南行”的错觉的关键。如同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古代中国人对日本列岛位置的理解大大偏向南部。所谓“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会稽在今浙江绍兴,而东冶则在今福建福州,就是说古人认为倭在相当于今天北纬 $25^{\circ}$ — $37^{\circ}$ 之间(因为当时尚不涉及本州北部和北海道,故从略),这就意味着倭是在方形大地的东南端。尽管带方郡位于天下之中洛阳以东且偏北,但从带方郡南行万余里后,仍可得出大体抵达四海之内的大地的东南边缘的结论。

这种把倭国想象在大地东南端的思路,恐怕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已经向东南前进七千余里。第二,其后又“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翰海,至一支国……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庐国”。这里的三次渡海均向南行,(第一次渡海虽未讲“南渡”,但后文有乘船“南北市采”,可知是为南行)所以必定到达大地东南端。我们知道,从朝鲜半岛南端向对马、壹岐至松浦实际上是向东南航行,但《魏志·倭人传》却记为“南渡”,方向已有谬误。一些学者认为,记为“南渡”是古人在记述方向时简单化使然。但笔者以为,魏使在报告重要的航行方向之时势必审慎,不会无端将东南行程记为“南行”,何况后文中还再三出现“东南陆行五百里”、“东南至不弥国百里”的记录。造成以东南方向航海为“南渡”的原因,似乎可以作如下考虑。身为魏使的带方郡使节并不谙熟航海,而且三国时期的航海尚无罗盘导航,⑩而主要是靠以海岸、岛屿为标志的“对景航行”。岛屿作为航标只有标志意义,不能体现方向,在高度较低的古代木船上能够眺望的岛屿有限,加上海上气候和能见度的影响,航行应主要由太阳和星辰来确定航向。对马海峡中因季节流动着流速为 $1\sim 1.5$ 节(每昼夜约24海里)的北上洋流,⑪对船产生大约为每小时1850米的横向推力,这给航速在每小时约4公里左右⑫的木船的影响非常之大,只有将航船的船头指向正南,才能驶到位于东南的岛屿和九州的松浦。古代倭国渔民对海流的认识水平已不可考,中国辽东和朝鲜渔民对航行倭国的航路当然不如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沿岸航行那样熟悉,至于使者本人自然不懂海海中洋流知识,⑬所以将船头指示的正南方向误以为行驶方向是完全可能的。第三、在末庐国登路后,又“南行”或“东南行”数国,所以便认定自己已置身于大地的东南端了。

### 三、太阳定位与方向记录上的 $90^{\circ}$ 偏转问题

为什么将倭国置于大地东南端会影响使节及通交人员对方向的判断呢?这个问题要从古人的方位概念和定位方法来考虑。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天文学非常发达,早在西周已有以太阳、星辰判定方位的成熟经验。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文献《考工记·匠人》中已有:“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景~~以悬~~景~~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是说工匠施工时,平整土地,而后垂直悬挂准绳,以观表影,观测日出和日没

时表影位置,白天参看日中时分表影方向,夜里参看北极星方位,以定出准确的东西方位。不难想见,这种被工匠普遍应用的定向方法也必然为早期的地图绘制所利用,并成为人们通常判定方向的基本方法。

然而,对于魏使来讲,依靠太阳判定方向甚至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因为尽管夜观星象是准确定出正北方向的简捷方法,但此法只能适用于长期居住的熟悉地域。在陌生的国度中,每天因行进变换住所,而且翌日昼间又前进在荒山野岭,其行路必然曲折多变,即使夜里得出方向也不足以指导辨别白天的前进方向。而白天对方向的辨别自然是依据太阳所处的方向来理解自己进行的方向。

我们知道,相对于地面上的观测者而言,太阳有两种视运动:每日的东升西落和每年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黄道运动。对地处北半球的人来讲,朝阳从东方升起,正午在南方上空达到最高点,傍晚从西方落下,这是古人长期观察得出的生活经验。古代中国人素以洛阳作为“天下之中”,西周成王营建洛邑的理由便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吕氏春秋·审分览》也讲:“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魏校《地理说》亦言“洛阳,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天地之中也……以天下大势言之,长安龙首穴也,洛阳龙心穴也”。天下四方以洛阳为中心,在古人心目中太阳东升西落,正午高挂在南方上空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及北方为前提的,而到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路博德征服南越设置的日南(今越南广治一带)、儋耳、珠厓(今海南岛)等南方边陲的九个郡,则是“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

关于太阳运行轨道与方式,古人有种种推测。屈原在《天问》中说:“出自汤谷,次于蒙汜”,后来的浑天家也认为太阳以阳城为中心,出自东方“暘谷”,落于西方“蒙汜”。后期的盖天说虽然改用旋转来解释日月运行,但太阳东升西落和在南方升至最高点还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在古人眼里太阳由东向西运行的南部边缘在何处呢?或者说太阳在南边大地的什么地方的上空呢?由于当时对世界知识的局限,人们对太阳的视运行轨道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前汉时代,只知道西方的极限是西海,北则瀚海,东面是大海,南则日南。到了后汉始知“北夔丁零,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sup>④</sup>。其中日南郡已是“在日之南”,“开北户以向日”。可见,当时是认为太阳视运行轨道在日南郡以北,即北回归线以北的。后汉时,天文学家才知道“日南郡去洛且万里,徙民还者,问之,言日中之时,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复南万里乃在日之南,是去洛阳二万里乃为日南也”。然而,日南郡在日之南的定见并没有得到普遍修正。譬如,在《后汉书》卷三十三刘昭注中仍使用为“日南郡,武帝更名,洛阳南万三千四百里”。日南的地名沿用下去,使太阳在四海之内的南边即中国南方边陲上空运行的观念继续流传。

那么,上述太阳运行轨道的认识对魏使产生何种影响呢?简言之,太阳在四海之内大地南部边缘上空走过的观念导致他们将东误解为“南”。因为三次“南渡”大海又在日本九州历经数国的魏使头脑中打上了“已经置身于大地东南端”的错误概念,由此便会推导出:“每天见到的日升最高点——太阳在大地南部边缘显示的方向是西方,而非在洛阳或北方辽东见到的南方的错觉。这样一来,如果迎着太阳走,就是向西走(实际上迎着太阳走仍然是向南走)的错误结论。而魏使在不弥国之后的长距离跋涉基本上是用身体右侧对着太阳前进,所

以就得出朝“南”走的误解。这当然是他们在“太阳高挂在西面上空”这一错误概念指导下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太阳始终高挂在南面上空，在日本九州用身体右侧对着太阳走，无疑是在朝东走。结果，魏使便把实际上的“东行”误记为“南行”。

这里还必须作两点解释：第一、白天把太阳最高点当作西方的认识似乎同夜晚用星辰判定的北方矛盾，但如前所述，使节每天在陌生的土地上行进，这种方向的矛盾既不存在，又容易化解；第二，如果认为自己置身于大地东南端，看到的正午太阳是西面，那么日升方向当为东北，日落方向当为西北，但在“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的山区，使节携带大量回赐物品（倭使节则携带贡品）和武器、干粮等辎重，在荒山野岭中连续跋涉，加之朝有露水浸湿，暮有蚊虫叮咬，很难想象他们会日出而行、日落而息，相反倒是太阳升起后出发，落日前歇息的估计更为合理。因此，用白天中午的太阳位置来判断行进方向便是自然的了。

#### 四、一个相同的例证

以上从魏晋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出发，分析了魏使的方位意识并探讨了误记行走方向的原因。这种推测能否在历史上找到相同的例证或史料、实证方面的凭据呢？笔者认为，与之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人的印度洋航海活动似乎提供了一个佐证。

两汉三国时期，中国人为贸易而远航黄支国。所谓黄支国，经史家考证为今天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建支补罗。<sup>⑮</sup>无独有偶，中国史家如汉代的应劭和晋代的范曄均将这个在中国西面的黄支国记为“日南之南”，即中国的南面。原因何在？船队启航于洛阳正南而偏西的合浦郡，因沿岸航行，越过金瓯角后需要西行至暹罗湾西岸的都元国，而后南至马六甲海峡后又再朝西北行驶。<sup>⑯</sup>这样一来，水手们便会得出已到达四海之内大地的南端的概念。由于当时对南方海外各国同西域如何邻接尚未形成明确的地理观念，出于前文所述的同样的误解，船队很容易将正午的太阳看作“东方”。于是，沿孟加拉湾北岸向黄支国的长距离西行便成了“南行”，结果留下了黄支国在“日南之南”的错误记录。

当然，对方向的错误认识并不妨碍船到达正确的目的地。因为当时的航海是以沿岸景物、岛屿作为参照系的经验基础上的“对景航行”。无论观念上的方位是否正确，均可以凭经验抵达目的地。就此而言，西行航海与魏使节在“大地的东南端”去向邪马台国可谓异曲同工。

####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魏志·倭人传》中关于邪马台国的里程和方位应作如下理解。首先、里程的记录是基本可信的，对此持“畿内大和说”的中日学者已作过详尽考证，本文不再赘言。其次、方向中的问题并非史书在刊刻传抄中的谬误，而是使节及其他通交人员理解上的错误。他们把不弥国之后的实际上的东行报告为“南行”，致使史书中留下千古悬案。

此外，笔者还想强调一点，古代中国天文学、地理学十分发达，地图学亦较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史官并未曾亲自到过日本，撰写史书的资料只能来自使节的报告，而这些人认识水平同精通天文地理知识的史学家、天文学家、地图学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